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翻译制度化研究

詹成, 张晗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外交翻译活动是建构外交理念、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家作为翻译的高位主体, 从政治、外交需求出发, 对外交翻译行为进行组织管理, 我国外交翻译由此进入制度化过程。本文在国家翻译实践维度下考察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三大制度核心要素的组合作用, 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翻译制度化的建构机制与阶段特征, 认为该时期的外交翻译制度化以翻译群体的组织结构、行为模式和共同信仰为表征, 以翻译机构与人才培养的专业化、翻译行为与翻译流程的规范化, 以及翻译教育与实践的内化为路径, 得以确立并发展。

关键词: 新中国; 外交翻译; 制度化; 国家翻译实践; 翻译史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22X (2023) 04-0008-07

0. 引言

翻译作为一项社会交往活动, 随着实践的复杂程度增加, 会逐渐超越“个人”或“小组”独立操作的松散而不固定的模式, 走向依托组织制度的规范化、有序化的固化模式(任东升、高玉霞 2015)。翻译制度化是翻译被赋予使命色彩后的必然趋势, 体现国家组织制度对翻译的干预和控制。外交翻译是国家翻译实践的重要载体, 是国家机构翻译的典型代表, 具有政治性和民族性特征, 本质上是制度化翻译, 同时也是国家翻译能力和外交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家出于政治、外交和文艺政策上的考量, 对翻译活动进行了宏观调控, 翻译被纳入制度化体制, 因而具有服从和服务国家政治的功能(任东升、赵禾 2018)。相应地, 我国在语言教育、译员培养、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规范, 设立了外交翻译专业机构, 制定并践行了国家至上的伦理规范, 形成了较为科学的行为模式, 为外交翻译制度化提供了社会结构和活动框架。这一阶段是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三大制度化要素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

本文将 1949—1966 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阶段视为新中国外交翻译制度化的发轫时期, 通过细致考察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外交翻译实践,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翻译活动为主, 结合其他外交翻译现象, 探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翻译活动制度化的建构机制、阶段特

收稿日期: 2023-02-28; **作者修订:** 2023-05-16; **本刊修订:** 2023-05-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研究”(18BYY019)

作者信息: 詹成(1977-), 男, 湖北武汉人,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口译理论与实践、翻译教育、口述影像, E-mail: zhancheng@mail.sysu.edu.cn; 张晗(1992-), 女, 黑龙江哈尔滨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口译理论与实践、国家翻译实践、口述影像, E-mail: zhanghan6273@126.com。

征及效应。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翻译制度化背景

国家翻译是历史的具体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翻译制度化有着复杂的外部促动和内生力量。一方面, 新中国受到国际关系上的压力, 需通过外交翻译活动突破外交封锁防线, 赢得权力资本; 另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的外交翻译活动需与时俱进, 适应执政环境和外交需求的新情况。这一阶段的历史背景为解释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翻译制度化的发生提供了一定的理据。

1.1 打开外交局面的迫切需求

新中国成立后, 针对如何争取国家被承认并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如何争取国际援助和保障国家安全等具体外交问题, 我国领导人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外交方针(黄庆、王巧荣 2016: 10), 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确定了方向与原则。中国亟待在多边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 而外交翻译实践则是新中国传递国家话语的重要渠道。1949年11月8日, 外交部举行成立大会, 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创建新型外交队伍, “一支立场坚定、忠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纪律严明、有战斗力的队伍……一支文装解放军”(裴坚章 1989: 302-303)。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际政治气候和国家外交战略使外交翻译行为目标明确、动机强烈, 赋予其政治任务的属性。

1.2 继承外事翻译的优良传统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外交工作队伍建设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 有一定的历史沿袭。当时,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和国统区都建立了对外交际的部门, 担起“半官方半独立”状态下翻译工作的重任。1939年, 设立延安交际处, 通过外国友人将延安介绍给世界; 1944年, 设立军委外事组, 接待并配合美军观察团的相关工作; 1946年, 成立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负责内战停战谈判、联系国民党和美方等任务(袁西玲 2014)。这些外事活动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外事翻译人才, 如师哲、陈家康、章文晋等。中国共产党的“政权翻译实践”(任东升、李江华 2014: 15-22) 储备了外事翻译人才, 建立了外事翻译机构的雏形, 培养了外事翻译工作的优良传统, 在准国家翻译实践向国家翻译实践的过渡中为新中国外交翻译的制度化夯实了基础。

2.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翻译制度化要素

制度是用以调整个体行动者之间以及特定组织内部行动者之间关系的权威性行为规则(体系)(邹吉忠 2003: 68)。美国组织社会学家理查德·斯科特(Richard Scott)总结了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 即规制性(regulative)要素、规范性(normative)要素和文化认知性(cultural cognitive)要素, 他认为“这些制度要素或层面, 以相互依赖和相互强化的方式, 塑造了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框架, 既能容纳又能展现这些结构的力量和弹性”(Scott 2014: 59-70)。其中, 规制性要素确立规则, 由高度专业化的机构来负责实施; 规范性要素强调的是社会生活的规定性、价值评价性和义务责任性层面, 指导具体的行动者如何行动; 文化认知性要素建构人们关于社会现实本质的共同理解, 创造了意义生成的框架, 与组织逻辑和更广泛的意识形态相嵌套。以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要素三大要素观照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翻译活动, 可以梳理出外交翻译的制度化表征、实现路径和具体指标(如下页表1)。

表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翻译制度化要素

基础要素	制度化表征	实现路径	具体指标
规制性	组织结构	翻译机构专业化 人才培养制度化	设立翻译职能部门, 体量不断扩充 建立语言教育基地, 制定培育计划
规范性	行为模式	翻译行为规范化 翻译流程科学化	宏观指导与微观规范相结合 翻译质量和翻译效率有保障
文化认知性	共同信仰	教育与实践内化	国家意识和价值诉求有机统一

外交翻译制度化要素可具体体现为翻译的组织结构、行为模式和共同信仰。在国家翻译实践中, 国家运用权力与实力对外交翻译进行全局性操控, 分别通过翻译机构专业化、人才培养制度化、翻译行为规范化、翻译流程科学化, 以及翻译教育与实践内化, 保障国家翻译实践。规制、规范与文化认知作为制度的三大维度, 构成了外交翻译制度化的有机整体, 使翻译主体遵从制度规定、履行制度功能、服务国家翻译实践。

2.1 外交翻译组织的规制性要素

制度与组织相互依存, 制度使组织行为趋同并合法, 组织为制度提供运行空间 (张学娟 2019: 173-174)。在制度的规制性层面, 以翻译管理组织和培育组织的专业化为表征, 通过设立和升级国家翻译机构、制定人才培养模式, 可实现外交翻译组织结构制度化。

1) 翻译机构专业化

外交部建立之初, 仅在办公厅秘书处下设编译科, 主要负责俄语和英语的翻译工作。若有重要外交事件, 译员常从各部门抽调组队。1951 年, 朝鲜战争停战谈判, 遣返战俘工作需要翻译协助进行, 时任美澳司北美科科长凌青为翻译队队长, 队内召集了各行各业人士, 如懂外语的医生、大学生、政协委员等“客串”翻译 (凌青, 等 2005)。第一次日内瓦会议前夕, 周总理指示时任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将翻译人员全部组织起来进行训练考核, 在世界青年布拉格和平理事会工作的董宁川被急召回国参加考试, 并入选日内瓦代表团, 成为中方领导人的首席法语翻译 (董宣川 2008)。可见, 在面对重大或紧急外交事件时, 仍存在译员数量短缺和临时征调的问题。随着外交业务的不断发展, 1955 年, 外交部设立了专门的翻译部门, 即办公厅一科 (翻译科)。1964 年, 翻译处成立, 负责英、法、俄、西、阿 5 个语种的翻译任务 (施燕华 2009)。从编译科、翻译科到翻译处的组织架构升级, 标志着外交翻译实现了从外事机构的附属业务转变为智力集约化、资源整合化的专业独立的职能部门, 这是外交翻译制度化的重大进展。

2) 人才培养制度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缺乏专业的翻译人才, 国家根据外交需求进行了语言教育的战略部署, 统筹规划翻译人才培养。周总理在 1949 年 10 月至 1951 年 8 月的外交部工作报告中指出, “除了加强在职干部的各种学习外, 还设立了以下教育机构: …… (三) 俄文专修学校第三部: 培养俄文翻译人员 (并准备东欧国家语文) …… (四) 外国语学校: 专门培养翻译人员, 现分英文、法文、德文三系……, 为适应客观要求, 该校今年拟增设印度文、日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等系” (廉正保 2005: 49)。根据国家外交形势的变化, 1957 年 10 月, 周总理指示外交部“必须配齐所有兄弟国家和各重要资本主义国家语文的翻译”, 以外国语学院

为培育基地, 国家出资聘请专家。20世纪60年代中期又制定了新的培养翻译的五年规划(戚义明 2006: 39-42)。连续性的部署筹划推动了翻译人才培养制度的落实, 从根本上改善了译员短缺的问题, 为外交翻译实践蓄力。翻译院校规制和师资的建设, 体现了国家对于翻译人才的全局性、长远性规划和集约化、专业化培育, 完善了翻译人才保障体系, 为外交翻译制度化提供了智力支持和执行主体。

2.2 外交翻译行为的规范性要素

规范性要素强调在既定的情境和角色中, 如何行事才适当, 符合规范性的期待。在国家意志指引下, 通过规范翻译群体各成员的行为, 来保证翻译群体组织存在的秩序性和稳定性(任东升、高玉霞 2015), 也是翻译制度化的路径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译员实现了规则与行为、能动性和受动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 受权力场域的归化, 接受高位主体的宏观指导, 并以集体行为方式回应和塑造微观规范; 另一方面, 遵循科学化、规范化的翻译流程, 保障国家翻译质量和效率, 是翻译制度化的重要表现。

1) 翻译行为规范化

外交语言的政治敏感性、外交翻译的特殊性和中国外交话语的民族性决定了国家外事部门在翻译活动中不能套用一般的翻译伦理标准(高玉霞、范大祺 2019)。宏观上, 外交译员们遵循忠诚于国家的翻译伦理及规范, 同时在实践中通过规范赋能形成了实用的外交翻译思想, 自下而上地推动了翻译行为规范化。例如, 中美大使级谈判代表团翻译过家鼎(1984)曾表示, 为使听者易懂, 译文(无论是中文还是外文)应该尽量口语化, 句子简短, 用词朴素。保加利亚语翻译刘知白认为翻译要模拟讲话人的口吻, 把他的语气、感情色彩都传达给听者, 译员不能根据自己对所谈话内容的见解随意地增删或改动谈话者所说的话(曹文译 2013: 326)。俄语翻译王凤祥强调翻译要给自己定位, “给在场的人留下的感觉是, 你在那里又不在那里, 有你又没有你”(曹文译 2013: 210)。这些伦理规范符合翻译活动的基本原则, 实现了制度的实质合理性。

2) 翻译流程科学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翻译实践, 无论是译前准备、译中质量把控还是译后定稿, 都呈现出流程化、精细化、规范化的趋势。1960—1966年间中苏关系恶化, 《人民日报》在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期间连续发表9篇长篇评论(简称“九译”), 对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予以全方位的批评(辜晓进 2020)。“九译”的翻译流程是翻译班子的中国专家负责初稿, 写作中提供资料的各单位同时负责提供外文的原文供翻译参考, 中外专家负责审稿润色, 而最后的定稿人为资深的中国专家和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外国专家(任东升、王晓梅 2021)。“九译”的翻译实践, 以专业严密的翻译流程规范体现出国家翻译实践高度的政治性和自利性。外交口译也同样遵循科学的过程规范, 拥有强大的团队做后盾, 老同志事前帮助释疑, 出谋划策设计预案, 其他同事负责模拟陪练, 实战之日也会有资深的翻译旁听(曹文译 2013: 193)。翻译流程的规范运作为保障国家翻译实践创造了一切有利条件, 实现了制度的形式合理性。

2.3 外交翻译群体的文化认知性要素

制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构成了任何个人存在的前提, 共同的文化背景是制度在其中运行和展开的基本条件(邹吉忠 2003: 72)。规制性和规范性两大制度要素的实施都离不开背后

的意义框架和价值诉求。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译员们在外语教育中内化了对国家意识的认知。1951年，德语翻译梅兆荣进入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经历了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后，强化了社会主义意识，“使我树立了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宗道一、傅铮铮 2004：181），“祖国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曹文泽 2013：12）；西班牙语翻译汤柏生表示“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曹文泽 2013：72）。他们的职业选择是政治选择的延续，构成了共同的文化框架。其次，在翻译实践中，译员们遵循国家至上的翻译实践理性。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翻译工作时常是在炮火中进行的，英语翻译邱应觉回忆，“有时遇上深夜敌机飞临上空，赶紧抱上文件公文包，跑到附近的防空洞”（宗道一 1996：68-71）。强烈的使命感根本在于翻译价值和译员认知的契合，是译员基于对自己信仰价值的尊重而做出的自愿选择。在外语学习和翻译实践中，译员们对国家意识的认知和对翻译价值的诉求有机统一，对共同信仰的理解、认识与接受使译员角色真正实现了“制度化”。

3.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翻译制度化的特点

翻译制度化是国家对翻译实践的一种治理手段，是渐进的、动态的、被建构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翻译制度化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其阶段性特征，体现在制度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和组织运行的兼容并包。

3.1 高位主体凸显

制度化是各层级主体互动的过程，离不开权力场域强有力的政策推动和直接指导。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领导人作为国家翻译实践中的高位主体，在机制建构和翻译实践方面直接参与外交翻译制度化建设，尤其在规制性和规范性层面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顶层设计上，周恩来总理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强培养翻译干部工作的意见》（1961）和《关于解决当前外语干部严重不足问题应急措施的报告》（1964）（裴坚章 1989：316-327），是外交翻译制度化的指南针和催化剂。在具体落实上，陈毅副总理阐明了外文、外交业务学习与政治学习的相互关系，批驳了一些“左”的看法和做法（丛文滋 2003）。在翻译实践中，高位主体也会给予专业指点。如对于某一词的译法常由周总理亲自敲定，“……往往在午夜或拂晓前，我们就会从总理秘书的电话里接到总理的指示”（过家鼎 2004：1-2）。在外事活动间隙，周总理还经常对翻译人员进行考试（施燕华 2013：45）。高位主体对翻译工作亲自指导，跨越级别与低位主体互动，促进了译员翻译规范的养成和外交翻译制度化的发展。

3.2 运作模式灵活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翻译制度化程度较低，精尖翻译人才及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仍处于短缺状态。随着翻译部门体量升级，外交部的翻译机构由俄语和英语扩充到英、法、俄、西、阿5个语种，为保障国家翻译实践，形成了“通用语种常驻化+非通用语种灵活化”的管理模式。涉及多语种重大外交翻译任务时，会临时成立翻译处组，举全国之力召集翻译人才形成专家翻译群体。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邀请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列席会议。“从全国许多部门调来的精通外语的翻译专家……分别来自中调部、中联部、外交部等单位翻译和教学的岗位”（白国良 2002：47-48）。日语翻译刘德有由原单位外文出版社被借调至中共八大翻译处，对大会文件和讲话进行文字翻译，并为领导人和国外代表所作报告做同声传译（刘德有 2012）。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翻译任务，常统筹制度内外和机构内外的译员形成合力。

4.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翻译制度化的成效

1949—1966年期间的外交翻译制度化处于起步阶段,具有显著意义。翻译制度化运行的产出即制度化翻译,保障了国家翻译实践,推动了外交话语平等,使外交翻译的定位、功用和价值得以明晰,为后续制度的成熟和升级增强了适应性和内聚力,最终为国家外交事业做出贡献。

4.1 赋能国家翻译实践

外交翻译制度化通过集约化的智力配备、权威的翻译政策、高效的运作模式、国家利益至上的伦理规范,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翻译实践提供了制度保障,使我国的外交翻译从先天不足到自给自足,极大地释放了翻译生产力,翻译国家队的雏形始现。由阎明复、朱瑞真、赵仲元组成的中央办公厅翻译组亲历了中苏关系从友好到破裂(阎明复 2015);以章文晋为首的日内瓦会议翻译组见证了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身份参加多边外交活动(张兵 2016);万隆会议上周总理的英文翻译浦寿昌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理念传向世界(张彦 2009)。这些制度化实践为70年代中美破冰、中国重返联合国在内的第三次外交高潮储备了国家翻译经验。

4.2 推动外交话语平等

国家对于外交翻译的重视,推动了外交翻译制度化,而制度化实践的专业表现和政治使命则有助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新中国成立后以国家外交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举国之力建构外交翻译制度,对内保障了国家利益的实现,对外推动了国际话语关系的演变。中苏数次交往中,中方译员阎明复和李越然得到双方领导人的信任和肯定,在后期两国关系交恶时,亦能通过制度化的翻译行为准确地传达国家意志和立场。制度化的外交翻译使得中国在外交交锋中赢得了语言资本和象征资本,实现了外交翻译的“政治等效”,获取了“话语平等”(杨明星、张琰 2020)。

5. 结语

新中国成立后,外交翻译作为制度化翻译,配合国家外交行为,以言行事,使新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完成国家自我形象塑造和政权合法性诉求,为国家赢得了外交资本和话语权。国家作为具有双重性身份的行动者,既是发起外交翻译实践的主体,又是行动和规则的制定者,通过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发挥合力,确立和保障了制度实施。翻译作为一种建构对外话语和民族身份的力量,其制度化的过程彰显了国家翻译实践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内在机理和底层逻辑。

翻译制度化的产生有其观念前提,受到国家需求的制约与引导,并以其为转移。翻译制度化是国家意志的上层建筑表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外交发展的需求和理念为外交翻译制度化:1) 提供了价值定位和合理性,规约国家翻译实践的原则、理念和功用;2) 预制了制度产生与运行的逻辑框架,保证国家翻译实践的适用性、效力和效率;3) 赋予了制度实践的评估依据,反思国家翻译实践的决策、秩序和效果。

翻译制度化是国家翻译实践的生长基因,制度化翻译是国家翻译实践的发展产物,二者互为因果、相互促成,是历史的具体的不断延伸的链条。国家翻译实践以发展为取向,翻译制度的建立和变迁是国家意志和翻译实践、理性建构与能动演进对立统一的过程。国家利益锚定了制度化翻译体系的基本框架,翻译制度化则构成了国家翻译实践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国

家翻译实践的规律性特征。当前新形势催生了翻译工作的重大意义，翻译制度化与制度化翻译是历史之鉴，更是时代之需，必将继续实现服务国家战略的功能和价值。

参考文献：

- [1] 白国良. 参加中共“八大”翻译忆思 [J]. 纵横, 2002, (3): 47-48.
- [2] 曹文泽. 共和国领袖身边的翻译们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
- [3] 丛文滋.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对外交学院的关怀和指导 [J]. 外交学院学报, 2003, (2): 1-4.
- [4] 董宣川. 共和国的资深翻译家——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法语翻译大理白族人董宣川 [J]. 大理文化, 2008, (3): 52-55.
- [5] 高玉霞, 范大祺. 国家翻译实践的理论探索——国家翻译实践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高层论坛综述 [J]. 上海翻译, 2019, (5): 91-93.
- [6] 辜晓进. 从“九评”到“新九评”: 大国论争下党报批评性话语的历史变迁 [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1): 89-98.
- [7] 过家鼎. 关于政治会谈口译的点滴体会 [J]. 中国翻译, 1984, (11): 16-21.
- [8] 过家鼎. 周总理与他身边的翻译人员 [J]. 上海科技翻译, 2004, (2): 1-2, 50.
- [9] 黄庆, 王巧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2012) [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6.
- [10] 廉正保. 建国初期的外交部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 [11] 凌青, 宗道一, 朱礼盈, 等. 从延安窑洞到北京外交部街(下) [J]. 党史博览, 2005, (2): 16-21.
- [12] 刘德有. 中共八大的同声传译 [J]. 百年潮, 2012, (2): 10-13.
- [13] 裴坚章. 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 [14] 戚义明. 周恩来与新中国的外事翻译工作——丛文滋访谈录 [J]. 党的文献, 2006, (5): 39-42.
- [15] 任东升, 高玉霞. 翻译制度化与制度化翻译 [J]. 中国翻译, 2015, (1): 18-23.
- [16] 任东升, 李江华. 国家翻译实践的功利性特征——以《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重译历程为例 [J]. 东方翻译, 2014, (1): 15-22.
- [17] 任东升, 王晓梅. “九评”翻译: “战时”国家翻译实践 [J]. 东方翻译, 2021, (2): 4-12.
- [18] 任东升, 赵禾. 建国初期翻译制度化的确立与效应 [J]. 上海翻译, 2018, (3): 7-11, 94.
- [19] 施燕华. 外交翻译60年 [J]. 中国翻译, 2009, (5): 9-12.
- [20] 施燕华. 我的外交翻译生涯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
- [21] 阎明复. 阎明复回忆录(一)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 [22] 杨明星, 张琰. 中英外交翻译中“政治等效”与话语平等辩证关系分析——从马戛尔尼使华到共建“一带一路”(1792-2019) [J]. 上海翻译, 2020, (5): 24-29, 94.
- [23] 袁西玲. 延安时期的翻译活动及其影响研究 [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4.
- [24] 张兵. 新中国杰出外交家章文晋 [J]. 百年潮, 2016, (8): 31-39.
- [25] 张学娟.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9.
- [26] 张彦. 周恩来在万隆旋转乾坤 [J]. 中国测绘, 2009, (5): 46-49.
- [27] 宗道一. 堂堂步入联合国——访前联合国秘书处高级官员邱应觉 [J]. 海内与海外, 1996, (1): 68-71.
- [28] 宗道一, 傅铮铮. 从延安窑洞到北京外交部街 [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 [29] 邹吉忠. 自由与秩序——制度价值研究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30] Scott, W. R.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2nd Ed.)* [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14.

(责任编辑 尚小晴)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Wartime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Truth about Nanjing Massacre, by REN Dong-sheng, JIAO Lin, p. 1

Wartim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take place in line with wartime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military cooperati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truth about Nanjing Massacr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enabled China to reveal Japanese atrocities and make our voice heard globally. When the Nanjing Massacre struck, China was weak both in national strength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The channel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world was blocked by the Japanese army and the global news agencies and public opinions were dominated by western powers. Facing such difficulties,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with its flexible and efficient operation, revealed the crime that Japanese army had committed in Nanjing through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ed materials are disseminated in many languages, by various media and for non-profit purposes, showing a consistency with wartime diplomacy, and a covert approach. As an indispensable page in translation history, the wartime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truth about Nanjing Massacre deserves attention and is expected to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wartime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Diplomatic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in the Early Period of PRC, by ZHAN Cheng, ZHANG Han, p. 8

Diplomatic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are indispensable for diplomatic philosophy development as well as national image building.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tate, as the top agent in translation network, organized and administrated diplomatic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out of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need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diplomatic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was thus initiated. In the context of State Translation Program,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synergy of three major institutional pillars (regulative, normative, and cultural cognitive), and explores the constitutive mechanis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diplomatic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represented by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behavioral pattern and shared faith among th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community, and with the approache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ranslation agency and talent training, normalization of translation behavior and procedure, and internalization of translatio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diplomatic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was established and developed.

On the Localized Program of State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Translation, by JIAO Dan, SU Ming, p. 23

The Localized Program (LP) makes up a bottom-up model of the State Translation Program (STP), forging a dialectical interrelationship of parts to the whole.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in China constitutes the core and dynamic sour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translation of which makes the key part of STP. This paper intends to identify the essential property, applicable features, practical objects and unique value of the localized program of state translation (LPST), then by focusing on the program of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translation defines the boundary in both its broad sense and narrow sense, and finally analyzes its practice, achievements and approaches. What the author holds is that either LPST or STP has its multi-values, and that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translation is of innovative and enduring significance characteristic of the new age and history in terms of its political meaning,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Besides, the paper looks into the holistic effect of LPST upon STP, attempting to provide a helpful reference for LP with the aim of further increas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ci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Gaslight Effect" and Mind Control of African Women: A Study of Alice Walker's *Possessing the Secret of Joy*, by PANG Hao-nong, SHEN Ping, p. 38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Possessing the Secret of Joy* is one of the classical works which reveals the problem of African women's circumcision. Alice Walker's depiction of the practice of circumcision has uncovered the tip of the iceberg of circumcision culture on the African continent, indicating that the traditional customs that cause harm and torture to African women are cultural dress that greatly violates their human rights and should be discarded. The basic theory of "gaslight effect" proposed by Robin Stein is adopted in this paper to study the internal correlation between "gaslight effect" and mind control from the relations between cultural manipulation of "gaslight effect" and socialized mind control, between the internalization of "gaslight effect" and individual mind control, and between the